



《哲学与文化》丛书 江怡 主编

走向文本研究的深处：

基于MEGA2的马克思文献学清理研究

鲁克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与文化》丛书 | 江怡 主编

走向文本研究的深处：

基于MEGA2的马克思文献学清理研究

鲁克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文本研究的深处：基于 MEGA2 的马克思文献学清理研究 /
鲁克俭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161-8161-4

I. ①走… II. ①鲁… III. ①马克思著作—文献学—研究
IV. ①A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200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5
插 页 2
字 数 482 千字
定 价 10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是

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2 版资料卷中的马克思文献学清理研究”（批准号 11BZX001）的最终成果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的马克思早期文本研究”（批准号 15ZDB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号 2012WZD07）

总序：从文化自觉到哲学自觉

江 怡

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文化的复兴被看做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在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在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创新自己的观念，在时代文化的多样变化中构建自己的特色，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挑战。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回应重要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充分的知识准备，更需要我们的思想智慧。

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已经向我们表明，文化自觉的树立正在极大推进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文化自觉的结果将改变当今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知道，这里的文化自觉首先是指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是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也是社会大众对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思想上的认同并不等同于行动上的一致。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并努力从行动上体现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更是指思想上的自觉，是我们在思想上真正形成对自身文化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认识，最后构建我们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的特殊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已经体现为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效应。这里的普遍性是指，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必须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理解，因此，这样的特殊性就必须以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形式加以体现。只有在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进入“自在自为”的阶段。然而，要做到文化的这种自觉，我们必须抓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这就是时代的哲学思想。确立文化自觉的关键，应当是做到整个民族在哲学上的自觉。

中华民族富有哲学思维的传统，中华文化蕴涵深邃的哲学思想。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还是《中庸》、《大学》，这些代表着中华民族智慧的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维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思想行动以个人认识为前提，观念形成以经验活动为前提。虽然中国哲学学科的自觉意识产生于西方哲学传入之后，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始终是哲学式的。中国人的智慧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中国人善于从身边的具体事项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并总是试图用这些道理去理解其他相关或相近的事项，由此完成对事项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关注的是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事物本身。第二，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更多的是从关系出发，更多地关注自己周遭生活环境的人和事，更多地考虑如何从各种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更重视整体和全局，而不是个体和局部。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智慧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对应：个人认识活动是以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为根据和出发点的，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经验归纳的特征；而经验活动本身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整体和全局，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又具有抽象普遍的意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出自我们的自觉意识，而是对前人长期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表达的提炼升华。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但是这种强调却是建立在我们理解了不同于我们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的基础之上，是我们通过不同哲学之间比较的结果。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给我们带来了对我们自身哲学的重新认识，甚至是对自身哲学思维方式的重新定位，激发了我们全面理解自身哲学的浓厚兴趣。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我们开始形成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

首先，哲学的自觉意味着我们对思想的主动认识。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① 思想正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是在成为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哲学由此产生。因此，哲学的自觉本身就意味着思想。这里的思想并非完全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活动，或者是对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理解，而是以概念的方式对我们认识活动内容的抽象概括，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概念化表达。这种思维方式就要求思想以概念的方式形成对我们所认识的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构造，也是对我们思想本身的概念规定。纵观我们目前的哲学思维，我们似乎缺少的正是这种对思想的主动认识。我们比较容易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理解，比较容易接受从经验中得到的知性认识，而不太愿意从概念的层面把握事物的根本性质。真正的思想应当在于能够在事物之上确立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能够在经验之先具备理解经验的基本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①

其次，哲学的自觉在于我们能够形成对事物的整体理解，能够从较高层面把握事物发展的基本态势。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②这种彻底不仅表现在理论本身能够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理论能够把握整体，能够从宏观上对事物有完整的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论还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此表明理论在实践中的彻底性。显然，这种哲学的自觉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历史的发展脉络，使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这种前瞻和预见正是彻底的理论自身具备的本质特征。经验主义的方法只会使我们裹足不前，完全从经验出发就会使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当我们真正形成了对事物的整体理解，只有当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我们在经验中面对的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各种现象，才能在事物的各种变化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

再次，哲学的自觉还表现在对理论思维的自觉培养，表现为对以往哲学史的学习和理解。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①他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的学习理解，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这里的理论思维能力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思维能力，一个是哲学思维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帮助我们对以往历史中出现的各种科学假说和科学思想形成恰当的判断，有助于我们认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理论和思想的创新程度。但科学思维能力仅仅停留在或者说只能在对经验现象的表层理解，即使是对经验现象的科学解释也不过是采用了逻辑的方法，对这些现象重新分类而已。而哲学思维能力则对我们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必须能够超越经验现象，通过对各种现象表面的理解达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把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了解以往哲学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理论观念，在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所谓新观念的历史踪迹。同时，这还需要我们具备超越历史和经验本身的抽象能力，能够从历史和经验中剥茧抽丝，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观念，用于解释我们当代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后，哲学的自觉更表现为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表现为对“绝对真理”的放弃和对现实实践活动的最终关注。按照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的运动不过是绝对精神在人类思维中的变化过程。虽然这样的辩证法是以概念和现实存在的颠倒关系为前提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思想是我们必须牢记的，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按照思维自身运动的方式理解事物的发展，也就是当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思维的辩证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思维活动如何与现实存在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思维活动的最后结果放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以检验。这就意味着，辩证法不仅运用于思维活动本身，更是运用于我们在现实的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实践活动。用辩证的方式观察事物，解释现象，提出观念，形成理论，这些就是哲学的自觉表现。

从文化的自觉到哲学的自觉，这体现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更深层理解，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负责态度。仅仅停留在文化自觉的层面，我们还只能从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上把握思想的力量，只能依靠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而哲学的自觉则帮助我们概念的层次上理解思想的构成和变化，从思想自身的发展中把握观念的历史作用。从更广泛的当今世界文化的视野看，能够做到哲学自觉，才会使我们的文化自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才会使我们自身的文化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理解。

本套丛书冠名《哲学与文化》，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因为文化是哲学的外在体现，而哲学则是文化的内在精神。我们将在本丛书中陆续出版国内具有影响的哲学学者以及其他学科学者的最新著作，充分反映国内学者们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独特思考。

本丛书得到国家“985工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大力资助，特此感谢！

目 录

导论	(1)
----------	-------

第一部分 马克思重要文本的手稿描述

第 1 章 《博士论文》写作前后的文本	(17)
第 2 章 克罗茨纳赫时期的文本	(42)
第 3 章 《巴黎手稿》写作时期的文本	(51)
第 4 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前后的文本	(66)
第 5 章 布鲁塞尔经济史研究时期的文本	(91)

第二部分 马克思重要文本的修改情况

第 6 章 《博士论文》手稿的修改情况	(99)
第 7 章 《莱茵报》时期政论文章手稿的修改情况	(117)
第 8 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修改情况	(125)
第 9 章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修改情况	(145)

第三部分 马克思重要文本的注释问题

第 10 章 《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政论文章的注释	(247)
------------------------------------	---------

第 11 章	《资本论》第 1 卷的注释	(260)
第 12 章	《资本论》第 2 卷的注释	(287)
第 13 章	《资本论》第 3 卷的注释	(307)

第四部分 马克思文献学的原创性研究

第 14 章	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几个文献学问题	(367)
第 15 章	关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讨论	(381)
第 16 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时间的文献学考证	(411)
第 17 章	关于马克思《评李斯特》写作时间的文献学考证	(430)
第 18 章	从“注释”看《资本论》中文版的编辑工作	(439)
主要参考文献		(460)
后记		(463)

导 论

一 本书的内容和结构

MEGA2 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即“《资本论》及其手稿”共计 15 卷，已于 2012 年全部出齐。第一部分“著作、文章和草稿”计划出版 32 卷，现已出版 18 卷（第 1—3、10—14、18、20、22、24—27、29、31、32 卷），尚有 14 卷（包括收录《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本的卷次）尚未出版。第三部分“书信”计划出版 35 卷，现已出版 13 卷（第 1—13 卷），其余 22 卷尚未出版。第四部分“摘录笔记”计划出版 32 卷，现已出版 12 卷（第 1—9、12、31、32 卷，其中第 32 卷是预编版），尚有 20 卷没有出版。总体来看，第一部分的出版已经过半，而第三、第四部分进展缓慢，都是刚过 1/3。

本书的文献学清理研究，重点放在第一和第四部分。第三部分是“书信”，涉及的文献学问题不多。第二部分是“《资本论》及其手稿”，涉及的文献学问题很多。但一方面，我本人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书的读者对象也设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学者和学生；另一方面，第二部分涉及的文献学问题太过复杂、琐碎，只有专门从事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史的学者才对此感兴趣。基于这两点原因，本书只对第二部分的《资本论》的文献学问题进行清理。

对于第一部分，本书重点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文献学问题进行清理。

MEGA2/I/1、MEGA2/I/2 包括了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著作、文章和草稿”，是第一部分的研究重点。限于篇幅，本书暂不对恩格斯文本的文献学问题进行清理。

MEGA2 资料卷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对正文卷文本“形成和流传”情况的文献学考证；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正文文本的“异文表”；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对正文文本的“注释”；第四个方面的内容是“文献索引”。“勘误表”也是 MEGA2 资料卷的标配，但对中文读者来时，其价值和意义不是很大。对于文本的“形成和流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将其编译成“题注”。对于文本的“注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基本上是以“尾注”的形式予以照译，当然内容上也会有所取舍和改动（或调整）。因此，相对于一般的“注释”，“题注”篇幅较大。对于“文献索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文献索引”的基础上，尽量吸收 MEGA2 的“文献索引”新成果。对于 MEGA2 文本的“异文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予以部分吸收，主要以“脚注”的形式体现。

本书所谓的“文献学清理”的含义，首先在于为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者提供基于 MEGA2 的最新、最可靠的文献学信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已经依据 MEGA2 提供给读者的文献学信息，包括“题注”、“尾注”、“脚注”和“文献索引”，读者和研究者可以放心地加以利用。对于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题注”、“尾注”、“脚注”和“文献索引”有意忽略而在笔者看来有价值的文献学信息，本书会予以呈现。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题注”、“尾注”、“脚注”和“文献索引”没有依据 MEGA2，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相关信息而出现文献学信息（如关于相关文本写作时间的文献学信息）过时的情况，本书将依据 MEGA2 而给予明确说明。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MEGA2 资料卷的“形成和流传”都附有“见证人描述”。“见证人描述”是 MEGA2 编辑者对马克思原始手稿情况（原始手稿的保存地点及保存状况、原始手稿的书写用纸和书写材料的情况、书写者身份、手稿页码编号等）或样书（样刊）情况（包括收藏地点）的描述。对于没有机会目击马克思原始手稿的研究者来说，根据这些信息再加上“异文表”，就可以在头脑中大致再现马克思原始手稿的情况。因此，并非只有见到马克思原始手稿的人才资格进行马克思文本研究或文献学研究。实际上，由于马克思的笔迹非常难以辨认，到荷兰阿姆斯特丹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查阅马克思原始手稿的西方学者（如吕贝尔、诺曼·莱文），也要借助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辨识誊抄稿。当然，不排除吕贝尔在独立编辑《资本论》时在有疑问的地方对照原始手稿作新的辨读，但这已经属于编辑范畴而非研究内容了。MEGA2 的最大价值就在于，研究者几乎不再需要亲自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就可以获得马克思原始手稿足够丰富的信息。那种“不利用马克思原始手稿就等于伪文献学考证”的指责，恰恰是不了解 MEGA2 的体现。

“见证人描述”是 MEGA 的重要特色。尽管 MEGA1 没有像 MEGA2 这样单列资料卷，但却包含了“见证人描述”的内容（MEGA1 称之为“手稿描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都没有提供与“见证人描述”相关的文献学信息。国内学者曾将 MEGA1 关于《巴黎笔记》的“手稿描述”译成中文，见《〈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第 2 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现重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3 卷（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版）第 22—31 页。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手稿和读书笔记目录”也被译成中文，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 年第 28 期（总第 82 期）。有国内学者在论文或著作中引用了这些文献学信息。但相对于 MEGA2 的“见证人描述”，MEGA1 的“手稿描述”有不少过时或不准确之处。因此，本书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基于 MEGA2 资料卷对马克思重要文本（特别是摘录笔记）的“见证人描述”作尽可能详尽的客观介绍。基于“形成和流传”（其中包括“见证人描述”）所作的原创性文献学研究，是本书第四部分的重要内容。

“异文表”是 MEGA2 资料卷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已经依据 MEGA2 的“异文表”，将主要的文本修改情况以“脚注”的形式作了说明。但一些较小的文本修改，或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编辑者认为不太重要的文本修改，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并没有得到反映。本书第二部分将呈现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遗漏的马克思重要文本的修改情况。当然，为了避免内容过分琐碎和冗长，本书也舍弃了不少意义不大的文本修改说明。另外，对于马克思文本修改的含意的分析，已经超出本书的研究范围，笔者将在以后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中将其作为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

的实证基础来进行深入研究。

在 MEGA2 资料卷中,“注释”是占篇幅最大的部分。对于 MEGA2 的注释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大都作了很好的吸收。但也有例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44、45、46 卷分别收录的是《资本论》第 1、2、3 卷的文本。第 45、46 卷出版于 2003 年,对应的 MEGA2/II/13 (1885 年由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 2 卷第 1 版)和 MEGA2/II/15 (1894 年由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 3 卷)分别出版于 2008 年和 2004 年。这意味着第 45、46 卷并没有依据 MEGA2。如果说不依据 MEGA2 对译文并没有太大影响,但对“注释”来说影响就很大。另一方面,即使依据 MEGA2/II/10 进行编辑的第 44 卷,在“注释”方面也有很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 23 卷的痕迹,并没有充分吸收 MEGA2/II/10 的注释成果,这就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资本论》的编辑质量。不仅如此,作为中央“马工程”成果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 卷本(2009 年版),其第 5、6、7 卷相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44、45、46 卷没有任何改进。为此,本书第三部分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44、45、46 卷的注释与 MEGA2/II/10、MEGA2/II/13、MEGA2/II/15 作对比,对中文版编辑者原创性的编辑成果加以充分肯定,对没有吸收或落后于 MEGA2 的注释,则予以明确说明,并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资本论》的编辑质量作出评价。

MEGA2 自 1975 年开始正式出版(1972 年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 1 章的试编版),迄今已将近 40 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MEGA2 编辑者内部对一些文本的文献学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于是出现了后出版 MEGA2 卷次的文献学考证结论修正已出版卷次相关说法的情况。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出版尚未过半,国内学者对于马克思一些重要文本文献学信息的了解,主要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提供的一些文献学信息,已经被 MEGA2 纠正,但这些纠正散见于 MEGA2 庞大的资料卷中,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已出版的相关卷次,也没有注意到这些纠正,仍然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相关说明。不仅如此,即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二版依据 MEGA2 提供了最新的文献学信息（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3 卷《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题注中关于《穆勒摘要》的写作晚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说明），并没有引起许多国内学者的注意，这些学者在其研究论文或论著中仍然以过时的文献学信息为基础。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本书第四部分重点对 MEGA2 内部在文献学考证方面的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与第一版之间文献学信息的不一致进行文献学清理，以使国内学者了解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最新考证结论，避免文本解读研究建立在过时的文献学基础之上。

笔者本人在做上述文献学清理工作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的文献学发现，本书第四部分也将这些文献学发现及其考证过程呈现给读者。根据本人的体会，在 MEGA2 资料卷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也是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原创性文献学考证工作的。

二 MEGA2 相关卷次“前言”或相关文本 “形成和流传”的中译文情况

一些 MEGA2 卷次的“前言”以及一些文本的“形成和流传”已经被译成中文，发表在《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①（大都为内部刊物），有些译文又被重新收在最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丛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开始出版）中。为了方便读者利用这些资料，这里将中译文发表情况罗列如下。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些“形成和流传”的中译文都没有翻译“见证人描述”的内容。因此，结合本书第一部分内容来阅读这些“形成和流传”的中译文，读者可以对 MEGA2 关于相关文本的文献学考证和描述有一个大体印象。

^① 其中前四种刊物是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编辑出版的。

MEAG2/ I

MEAG2/ I /1 前言（涉及《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的政论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89年第2期，译自MEAG2/ I /1第53*—80*页；MEAG2/ I /1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论活动（1842年初至1843年3月），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0年第3期，译自MEAG2/ I /1第963—978页。

MEGA2/I/2 前言（涉及克罗茨纳赫时期和巴黎时期），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12期（总第254期）第4—30页，译自MEGA2/I/2第11*—56*页。关于《德法年鉴》的出版以及马克思同《前进报》编辑部合作的概况，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15期（总第213期）第3—37页，译自MEGA2/I/2第529—568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成和流传”，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15期（总第213期）第38—48页，译自MEGA2/I/2第571—582页。《论犹太人问题》的“形成和流传”，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15期（总第213期）第49—54页，译自MEGA2/I/2第648—654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形成和流传”，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15期（总第213期）第55—57页，译自MEGA2/I/2第668—670页。《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的“形成和流传”，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15期（总第213期）第57—59页，译自MEGA2/I/2第923—925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形成和流传”，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15期（总第213期）第60—74页，译自MEGA2/I/2第685—702页。

MEAG2/ I /5 预编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1、2章）》（载《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的“形成和流传”（包括“见证人描述”），见《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MEAG2/ I /10 前言（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1849年7月至1851年6月的著作、文章和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0年第3期。

MEAG2/ I /11 第679—701页关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